

从《话柳永》说到其他关于柳永的话

思 嘉

在《大公报·读书与出版》第五二二期上看到罗忼烈教授新著《话柳永》的前言，其中有一小片段说：

“……更有甚者，如以柳永《玉楼春》‘九岁国储新上计，太仓日富中邦最’的‘九岁国储’为年方九岁的皇太子赵祯（宋仁宗），从而推断他的行踪和年代，这已经近乎笑话了。”

这个“笑话”是谁制造出来的，罗教授并没有点名，大概“为贤者讳”吧！为什么是“笑话”，罗教授也不说明，大概以为它之所以成为笑话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解释了。但是一般读者也许不明白，笔者认为有解释的必要。

这句话出自柳永《玉楼春》词，全文是：

星闼上笏金章贵，重宴外台疏近侍。百常天阁旧通班，九岁国储新上计。太仓日富中邦最，宣室夜思前席对。斫心怡悦酒肠宽，不泛千钟应不醉。

皇帝建醮祈福是例行公事，柳永乘机一共写了几首《玉楼春》歌颂宋仁宗。这首词除第一句是关于祈福的以外，其余都是歌功颂德的话：政治清明，存粮充足，国泰民安。

“国储”一词有两解：一是等于“皇储”，指太子；一是国家储蓄的粮食。《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柳永词的“九岁国储”就是用这个典故。他如《魏书·韩麒麟传》：“古先哲王，经国立治，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淮南子·主术》：“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白居易《太和戊申岁大有年诏赐百寮出城观稼》诗：“散为万姓食，堆作九年储。”不多不少，都说九年，也是本于《礼记》的。

“上计”是一种古代政制，战国、秦、汉时，每年终结，地方官本人（或派员）到京师上计簿，总结全年的钱、粮及人口等情况给朝廷打报告。《韩非子·外储》左下：“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柳词“九岁国储新上计”，是说各地的粮食生产年刚好送到朝廷，所以下一句紧接着补充说：“太仓日富中邦最”。

但有些研究者，由于不懂什么叫做“上计”，因而不顾上文下理，只管断章取义，把“九岁国储”看作年方九岁的宋仁宗，更进一步作为这一年柳永在汴京的证据。先是梁丽芳女士的《柳永及其词之研究》（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一九八五年六月）说：

“柳永另有玉楼春（星闼上笏金章贵）一词，提及‘九岁国储新上计’。据《宋史》所载，宋仁宗生于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四月十四日（阴历，下同），天禧元年（一〇一七）九月册为太子……柳永所指的国储，极有可能是指宋仁宗，如此一来，我们更可以肯定柳永在一〇一九年在汴京了。”（见该书页十一）

一年半后，谢桃坊先生的《柳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版）也说：

“我们从这组词的第二首（按指上面引录的那首《玉楼春》）便可知道其写作时间是在宋真宗天禧二年。词云……。这是为庆贺赵禎（后来的宋仁宗）册为太子而作。赵禎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一〇一〇年）四月，天禧二年（公元一〇一八年）八月群臣请真宗立皇太子以为国储，九月真宗册赵禎为皇太子。这年赵禎虚龄九岁。”（见该书页九）

以柳词的“国储”为太子，这个讲法显然是来自梁女士的，不然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了。关于立太子的年份，《宋史·真宗纪》和《仁宗纪》都说是天禧二年，梁女士是弄错了。依谢先生的计算，既然是虚龄九岁，那么不正合于“九岁国储”这句话吗？按《真宗纪》：“（天禧二年）八月庚寅，群臣请立皇太子，从之。……九月丁卯，册皇太子。”又《仁宗纪》：“天禧元年兼中书令，明年进封昇王，九月丁卯，册为皇太子。”两处都没有用“国储”字眼，谢先生为了突出“国储”来拍合柳词，于是说“群臣请真宗立皇太子以为国储”。一年之后，在他主编的《柳永词赏析集》（一九八七年七月巴蜀书社出版）的附录《柳永事迹考述》（页二七五），又依样葫芦了这个“九岁国储”。于是乎宋仁宗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变成“太仓日富中邦最”的米粮，让人“上计”去也！

《柳永事迹考述》中有问题的，远不止追随梁女士把宋仁宗当作大米这一件，又说：

关于柳永墓志铭。明代《万历镇江府志》记述了当时出土的柳永墓志铭情形：

近岁，水军统制羊滋，命军兵凿土，得柳（永）墓志铭并一玉篋。及搜访摩本，铭乃其侄所作。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文磨灭，止百余字可读，云：“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又云：“归殍不复有日矣。叔父之卒，殆二十余年云。”

这段记载，矛盾之处甚多。谓铭文“止百余字可读”，而所引者实为六十二字。从铭文内容来看，所叙很连贯，不似有磨灭痕迹，而且类似小传，不似铭文。篆额称柳永为“郎中”，而柳永以屯田员外郎终，也未被追赠。南宋后期俞文豹《吹剑录》引东坡幕士语，称柳永为“郎中”，当属一时偶谈。铭文所述柳永仕历为泗州判官、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这些完全与宋人记载不符，且竟不言柳永为睦州推官及屯田员外郎之事；而所谓“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更与事实不符。他是数见黜于仁宗，弄到改名后才得以转官的。柳永葬在镇江附近，后人在此为他制一块墓志铭不是不可能的，但主要的是铭文所述内容在现存文献中找不到任何一点旁证，因而它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页二七四）

其实这块残碑并无可疑，唐圭璋先生早已在《柳永事迹新证》里引用过了。“很值得怀疑”足足以见出怀疑者空疏而已，其证如下：

1. 《万历镇江府志》这段文字是引录宋人文献的，有“近岁水军统制羊滋”为证。羊滋在宋孝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曾任兵马铃辖，见《宋会要辑稿》卷四七一三，卷四九二〇，食货五也有羊滋事。可知柳永墓出土是在宋孝宗时代，并不是明万历年间才发现的。谢先生不知羊滋为宋人，又不知古方志引录前代著述往往不注明出处，所以误以为柳永墓志是万历“近岁”出土的。

2. 古人说某篇文章有多少字，只是约数，并不是认真去计算的。如苏轼的《万言书上皇帝》（见《经进东坡先生文集》卷二四）实为七千余字，《宋史·周邦彦传》说“献《汴都赋》万余言”，其实只有六千余字。谢先生因柳永墓志“止百余字可读，而引者实为六十二字”而怀疑是后人“为他制”的，那么《万言书》和《汴都赋》字数相差几千，岂不是更值

得怀疑了？何况古文中的“云”字可以表示原文全录，也可以表示节录呢。这些事儿都在常识范围以内，有读古籍经验的人是不会误会的。

3. 墓志铭的“志（志文）”和“铭（铭文）”是两件事，志文叙事，铭文是押韵的论赞，这是很普通的常识，而谢先生却弄不清楚。《镇江府志》明言“铭文磨灭”，“止百余字可读”的指志文，谢先生却说：“从铭文内容来看，所叙很连贯，不似有磨灭痕迹，而且类似小传，不似铭文。”就因读古书不多，不知道文字上的省略，误以为“止百余字可读”是指上一句“铭文磨灭”而言。

4. 宋人杂事笔记多谓柳永官至屯田员外郎是事实。郎中比员外郎高些，但高不了多少。谢先生断言柳永“未仕至郎中，也未被追赠”，在柳永的文献不足徵的情形下，还是存疑比较稳当吧！谢先生又说墓志铭谓柳永被“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更与其事实不符”。我们知道被皇帝召见的不一定是大官，如何证明柳永不曾被宋仁宗召见过呢？“宠进于庭”诚如谢先生所说与事实不符，但墓志铭这种作品一定是对死者“虚美”的，大文豪韩愈写了许多墓志文，被后人讥为“谀墓之辞”就是这个原故。其实不止韩愈，其他撰写墓志铭或行状的人也无不如此。谢先生对墓志铭这种文章认识不够，所以因“与其事实不符”便怀疑柳永墓志铭是伪造的。

5. 谢先生说：“铭文（按当作志文方合）所述柳永仕历为泗州判官、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这些完全与宋人记载不符，且竟不言柳永为睦州推官及屯田员外郎之事。”我们知道，柳永《宋史》无传，也没有宋人替他写过一篇完整的传记，只有一些零星片段、不尽不实的记载，一定缺漏甚多，地下出土文物恰好填补这些缺漏。建国以来，由于地下文物大量出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从来所不知道的东西，或矫正了历史记载的错误和补充了它的缺漏，我们不能因后来的文献没有记载而怀疑那些出土文献是假的。谢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以后来零星片段、不尽不实的记载来否定出土的文献。至于墓志铭中“竟不言柳永为睦州推官及屯田员外郎之事”，虽不合常理，也不奇怪，因为记官职不一定要如数家珍。地下文物当然也有伪托的，然而作伪者不会连宋人记载的那两个官名尤其是屯田员外郎都不知道吧！

对于艰奥的文义发生误解是寻常的事，但象“九岁国储新上计”以及柳永墓志铭的种种都是很普通的知识，确实不应该出乱子的。出乱子而又见诸文字，明眼人自然一望而知，但一般读者未必知道，信以为真，后果是相当严重的。